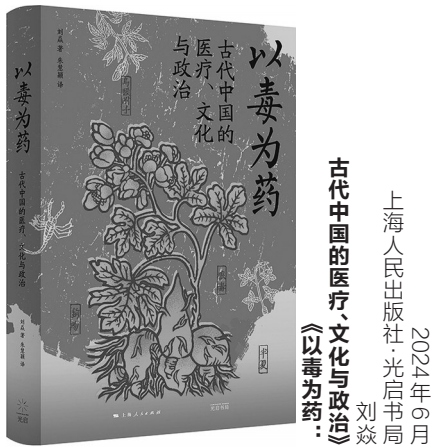


毒药的文化传记

□刘小朦



2008年,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发表了一项重大研究成果,研究人员对光绪帝遗体的头发、骨骼和衣物进行了取样检测,发现其中砷元素的含量明显高于正常值。经过详细的科学检测 and 数据分析,课题组最终得出结论: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然而成果的发布并未让这桩历史谜案画上句号,科学检测或许可以揭开光绪帝死亡的直接原因,却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下毒之人,而后者对于清代宫廷政治而言往往更为重要。但还是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广为人知的毒药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张亭栋发现三氧化二砷对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具有显著的疗效,因而让这种历史上声名狼藉的毒药焕发了新生,这无异于一项现代版的“以毒为药”。从宫廷斗争中的杀人工具到中药现代化的成功个案,砒霜从毒到药的戏剧性转化打破了当今观念中两者不言而喻的对立。

虽然我们承认“是药三分毒”,但在很多情况下,这里的“毒”常常被理解为在治疗中需要被规避或减少的“副作用”;而另一个我们所熟悉的俗语“以毒攻毒”,则暗示着“毒”只有在特定的极端情况下可以作为治疗手段使用。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毒”大体上是负面的、有害的,而“以毒为药”的治疗策略则是较为罕见而独特的现象。但这种观念自古如此吗?古人如何认识毒药?如何使

用毒药?在官闱秘史的猎奇故事与科学进步主义的叙事之外,我们又该如何讲述毒药的历史呢?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历史系副教授刘焱的新著《以毒为药》便从“毒”这一习以为常的概念出发,从医学知识、治疗实践、身体感等角度为读者生动讲述了中国古代对毒药的认知与使用,展现了一部涵盖医疗、文化、政治、市场与宗教的全景式图像。该书英文版于2021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得2023年度美国医学史学会韦尔奇奖章。

“抛开剂量谈毒性就是要流氓!”这句中文网络中的玩笑话经常被用于各类科普文献之中。尽管欠缺一定的准确性,但它却与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医生帕拉塞尔苏斯的名言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世上没有什么东西不是毒药,是正确的剂量划分了药与毒的界限。”帕拉塞尔苏斯的观点奠定了西方近代毒理学的基础,也成为西方医学史上药、毒分离的重要一环。刘焱指出,虽然中西方传统医学都有着运用毒药的傳統,但其对毒的态度却有着明显的分化。西方医学从公元一世纪开始逐步将所谓“绝对毒药”从药典中剔除,而有毒药物却一直是中国古代药学的核心内容。

虽然专业中医对有毒药物的使用并不陌生,但在普通人的日常认知中,中草药往往是天然、温和、安全无毒的。这种认知是一种现代性的产物,当我们回归古代文献时,它便会遭到极大的挑战。《周礼》有“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的记载,《素问》也有“毒药攻邪”的说法,这些都表明了毒与药之间的密切关联。作者首先从字源学与文献学的角度追索了“毒”的多重意涵。在《说文解字》中,除了“害人之草”,“毒”还被解释为“厚”;在早期医学文献中,“毒”指代猛烈之药。这都体现了“毒”所具备的正面意涵。“毒”的两面性在药学文本中得到了更突出的体现:在《神农本草经》中,有毒无毒是三品划分的重要依据;《本草经集注》也记载了多种运用毒药的方法,包括剂量控制、药物配伍和炮制加工。

如果以知识史的视角来看此书,或许会更清楚地认识到作者立论的重点所在。第二章到第四章虽然主题各异,但都在探讨一个知识史上的经典论题:知识与权威。知识就是权力:谁掌握知识,谁可评判知识的正确

性,谁可宣称知识的正统性。南北朝时期的医者试图通过编纂医书规范制药知识,并把市场中的采送之家与药商贬抑为技艺拙劣、见利忘义之徒。唐代规范医药管理制度、编纂《新修本草》,一方面意在为多元混杂的药物知识提供国家背书的权威性文本,另一方面也象征着中央向地方的权力渗透;但在权威性文本的使用中总要面对地方环境与资源的现实状况,地方性知识并未随着国家药典的编纂而消弭。中古疫病流行、鬼神致病观与对蛊毒的恐慌不仅带来了医学思想的变迁,同时也深刻影响着隋唐帝国的国家治理。对当今读者而言,医学与政治产生关联似乎是现代公共卫生兴起后发生的状况,但从春秋时代的“上医医国”,到唐朝的“治国如治病”,再到宋代的“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政治性的医学隐喻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不绝如缕,中国传统宇宙观中的人体、国家与宇宙之间也存在着相互感应的关系。因此,理解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医学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本书最后两章或许是最引人入胜的部分,它们关注了两类在中古中国广为人知的“毒药”:五石散和丹药。这一主题涉及了古人使用毒药更为深刻而终极的目的:强身与成仙。由于服散与服丹在中古士人中广泛流行,前人对此多有关注。然而在考索服食之风的兴衰历程之后,前人研究多强调其对身体和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本书则另辟蹊径,尝试从身体感的角度来解释一个长久存在的问题:尽管古人对服散与服丹的争议不断,但为何这一风气自魏晋至隋唐数百年间长盛不衰?作者论证,中古士人、医家与道士并非对石药和丹药的潜在危害一无所知;与此相反,他们时常会强调这类药物需小心服用,如有不当,它们便会转化为致命的毒药。但是毒背后的强大效力与服药产生的强烈体感却让古人相信,这是强身与成仙的必经之路。

虽然本书探讨的时代距今已过千年,但作者仍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结语中提到了青蒿素与三氧化二砷的成功案例,也提到了马兜铃酸事件引起的中药安全性争议。这也提示我们,即使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也难以把“药”和“毒”化约为简单的二元对立范畴。

□王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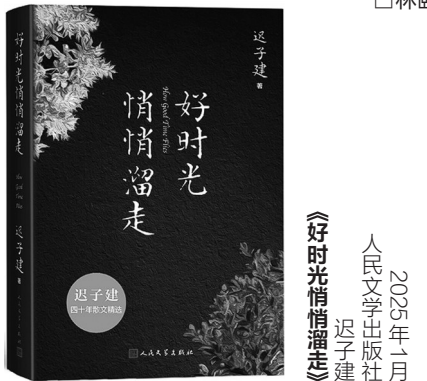
学家》最觉有趣,一位面带微笑的半裸女子引诱正在阅读的哲学家,这个香艳场景带来一个开放的选择:或者表达了一种精神追求的规劝,或者揶揄老学究的不解风情,究竟如何解读,端赖你对阅读有着怎样的态度!

毫无疑问,是书籍的普及推进了阅读私人化的进程,而阅读私人化又意味着思想与人格的独立。这一进程的重要性在于,阅读就此摆脱了某种崇高的目的,功利性的阅读退居其次,阅读本身自有独立的价值,从而为现代小说的出现铺平了道路。而女性阅读的兴起也同样得益于这一进程,因为正是通过阅读,女性读者才摆脱了父权社会的监控,进入了一个只属于她们的私人领域,她们从中体验到的是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她们追求的只是阅读的快乐,而不是所谓的“德育”。1875年,挪威画家迪特里克松即在其画作《农舍内景》中描绘了女性阅读的沉迷与陶醉;1939年,西班牙画家毕加索在其画作《躺着看书的女人》中描绘了女性阅读的沉思与默想……这些艺术品构成了私人阅读史与个人生活史的明晰线索,从中不难看出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嬗变。

《艺术中的阅读者》为书籍打造了一座纪念碑,当我们正在为纸质书的未来争论不休时,特里格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重新点燃起我们对书籍的惊奇和欢喜之情。特里格试图告诉我们,尽管当下与纸质书相类似的媒介都有点古老,却并未过时,因为纸质书的优势首先即在于它的触觉体验:一本书必须由读者激活,打开封面,翻开书页,做一些旁注或眉批……特里格认为,当我们的生活日益被网络掌控、个人信息均处于被监控和被迫踪的状态时,纸质书却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私密的“离线”机会,书籍亦因之成为一个健康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时光定格的“旧照片”

□林頔



打开《好时光悄悄溜走》,书里掉出一张照片。一个姑娘倚靠着湖边的栏杆,面庞稚嫩,右下角写着“1985年在大庆笔会”;翻到另一面,一位上了些年纪的女性抿嘴微笑,背景是植物摇曳的原野,右下角写着“2024年在哈尔滨”。

一翻一转,40年的光阴倏忽而过。这张照片,与这本书确实绝配,它很好地寓意了作家迟子建四十年的写作生涯,因为《好时光悄悄溜走》正是迟子建四十年散文的精选。

迟子建1964年生于漠河,1983年开始写作。人生六十,桑榆之年,在这样一个年龄,人们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回首往事,而作为一个硕果累累的作家,迟子建的往事有很多都藏在了她的作品里。迟子建出名的是她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群山之巅》等,虽然小说也有作家生活经历和经验的反映,但是,我们通过散文更能了解作家的过往,尤其那些与记忆有关的叙事与情感的描写,它们实实在在地诉说着她曾经走过的路,她的所失与所得。

首篇《灯祭》。“父亲在世时,每逢过年我就会得到一盏灯。”父亲过世后,每逢过年她就会想起父亲,还有父亲送给她的灯。灯,是暗夜里的光明,就像有盼头的日子。后来,父亲虽然不在了,因灯而起的思念仍然穿越时光的隧道,“那灯守着他,虽灭犹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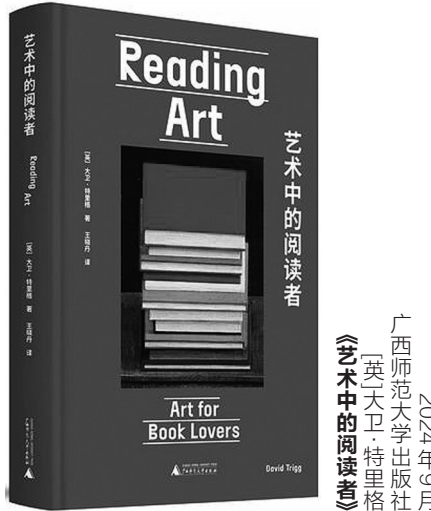
同名散文《好时光悄悄溜走》,“十年以前”几乎是引领每个段落的题眼,在不断的记忆闪回中,迟子建讲述着她家那个美丽的庭院,院子里的花草、家养的鸡鸭、菜园子和自留地、与住宅相隔不远的山坡和森林,十年之后,她在哈尔滨想起故乡,想起那些曾有过的朴实而温暖的日子。

《云烟过客》是全书最长的一篇散文。这篇散文记录了迟子建的家族史,从妈妈李晓荣18岁那年嫁给爸爸迟泽风写起,追溯祖父辈的艰难岁月,描写童年记忆里家庭生活的温馨时刻,讲述她自己文学之路的起步。迟子建是有一支好笔头的啊,寥寥数语就能刻画出人们的音容笑貌,围绕着她小时候的绰号“老猫”而展开的叙事,透着亲昵又有着孩子气的羞恼。

迟子建的散文情感真挚,毫不故作。她把自己对亲人、故乡的思念与热爱融入了文字中。书中有很多写亲情的文章,还有很多写故乡的吃食,写林间的动物,写溪流写天色写探出头的小草写绽放的春色,写悄然更替的四季风光。她的文字如潺潺流水,清新自然,例如在《我的世界下雪了》中,她用简洁而生动的语言描绘,“伴随着雪花那轻歌曼舞的脚步,山峦迎来了另一次的灿烂”,又到了落雪时刻,可是,爱人已经离她而去,环绕着她的,是一个清亮而又忧伤、浪漫而又寒冷的世界。情景交融,令人慨叹。

迟子建关注历史和文化,通过散文去探寻地域文化的内涵和历史的痕迹。她写鲁镇,写周庄,写巴黎,写尼亚加拉,每到一处,她就用眼睛观看风景,用心灵思考文化底蕴,用文字展现历史与现实的交融。她的散文不仅仅停留在情感和景物的描写上,还深入到对人性的思考。她写萧红,写鲁迅,写梵高,写俄罗斯的大作家,在文学的所来径上,她一次又一次与那些“不死的魂灵”相遇。迟子建以自己对待阅读和生活的感悟,在散文中表达了对往昔记忆的深刻哲思。她告诉读者,生活中既有苦难和挫折,也有温暖 and 希望,我们应该以平和、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的种种。往事不可追,在每一次的记忆塑造中,留住美好。

为书籍打造一座纪念碑



英国艺术评论家大卫·特里格的《艺术中的阅读者》,既是一部以书籍和阅读为主题的艺术作品集,又是一部关于书籍的进化史和私人阅读史。书中不仅收录了来自世界各地博物馆和私人藏家的近300件以书为表现对象的各种艺术品,让人一饱眼福,同时又以视觉的形式展示了从古至今的爱书人的形象:他们对书的爱惜之情,他们对书的守护之意,他们的阅读状态,他们沉迷于书中的种种场景——超越与枯燥,快乐与挫败,轻浮与激情,创造与毁灭……诚如作者所言:“此书向我们呈现了所有这些瞬间,它是文字世界与视觉世界之间的一次相遇。”

自从书籍诞生之日起,爱书人便应运而生,千百年来,他们之间彼此相伴,相互成就,